



馬克思說得對！

麥偉林著 李子忠譯

我越觀察中國就越發覺到馬克思的見解正確。這並不是指他所主張的廢除私產制、奉行無產階級專政或類似的過時產物。即使今日仍自認是共產主義者的人，也不會再相信這套。馬克思仍值得一讀的地方，就是他對資本主義的論述，尤其有關它在歐洲的初期發展。

這觀點竟出自自我這麼一個頑固地奉行資本主義的人，確實令人有點詫異。身為一份重要的亞洲商業雜誌的編輯，我每周都要為資本主義（尤其是外國投資）在中國的角色辯護，駁斥那些認為它腐蝕了中國社會的指責，或更多次要反駁那些我相信是出於善意卻被誤導的人，他們想把人權的規限強加在對中國的投資上。無論怎樣，到中國經商的人常被西方報章形容為殘酷剝削中國人民而致富的強盜資本家。

馬克思可不會犯上這樣的錯誤。這位共產主義祖師在描述商人階級的

興起如何改革了歐洲的封建社會時可以口若懸河。

但諷刺的卻是市場經濟正為中國產生了同樣的作用。

西方國家的商人為了替自己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辯護，他們指出起碼一些大公司會贊助善事和社會服務，諸如惠普文儀公司協助中國僱員自置居屋，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贊助中國年青經理到美國深造，萬國商用機器公司贈送電腦給中國學校等。這些都是幹得很出色的善事，卻未得到人們充份報道。但人們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揣測這些大公司的動機上，這實在令人困惑不解。其實這些投資者來到中國，向不斷增加的中產階級提供前所未有的選擇，促進了中國的進步，這才是更重要的事。

這就是馬克思所說，中產階級在歷史上扮演了「一個極富革命性的角色」之意。這是因為商人階級在封建制度的歐洲興起後，便改變了被統治者與統治者間的關係，削弱了後者的權力。私產權使人能脫離一些君主的專制力量，而人與人之間自由訂立的契約，亦取替了門第貴賤關係。就如馬克思所

說：「中產階級透過迅速改良生產工具，並藉著極之便利的通訊媒介，推動所有國家——甚至是蕞爾蠻的國家——邁向文明。」這不是我們今日在中國所目睹的事實嗎？

我們似乎值得回顧一下，充份地體會眼前的改變是如何深遠。只要我們還記得中國在數年前的景況，就會明白到這個改變是何等驚人，更不用說其改變的速度了。近在一九八七年時，北京差不多還有整個的被鄉村包圍著，城裡的大路很廣闊，幾乎只有自行車在上面走，使人好像身處一個巨型機場的跑道上一樣。在我們住宿的北京飯店裡找不到一個會說英語的人，而被所有導遊書指為最具大都會特色的飯店大堂，卻放著些古老沙發和椅子，上面還鋪著花邊罩子，彷彿一九四零年代的客廳陳設。大堂正中放著一座大冰箱，裡面塞滿了從香港運來的各款啤酒。那兒沒有甚麼社交場面可言，飯店房間內唯一可有的服務就是那千篇一律盛著熱開水的暖壺，和兩只花紋呆板的瓷杯。

今日這一切都改變了。從前人們只會穿著一身單調乏味的藍、綠色工人裝，如今大家都穿著入時，路上還出現了交通擠塞現象。十多家五星級飯店冒了起來，而我上次到訪時竟出乎意料的發現電視上多了各種選台，由《有線新聞網絡》和重播的《周末狂歡》以至中文配音的《仙樂飄飄處處聞》，應有盡有。我最近入住過的希爾頓飯店還舉行了一個墨西哥風情夜，晚上我們沿飯店散步時還遇到一間大型的「搖滾樂咖啡室」。當我和姻親參觀紫禁城時，竟有手提錄音導遊，而且還是以主演占士邦片見稱的羅渣·摩亞作旁述。雖然單調的毛澤東畫像仍然人掛在入口處，但這位國家主席的肖像已成了新中國的一件商品。二十多年前，紅衛兵在身上佩帶毛章以示擁戴。如今毛像已晉級成爲時尚，在所有重要旅遊點的紀念品店裡，都可以找到各款印有毛像的貨品，由手錶至汽車太陽擋都有。

這一切當然也帶有一點健康的粗鄙性。舊日的富戶早已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暴發戶」，

他們毫不尷尬地招搖過市。在富有的新城市中心裡，新中國百姓毫不避忌炫耀自己的財富。或許上海要算是最令人矚目的例子了。在一九二零和三零年代，上海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具大都會特色的城市。上海與香港同是英國第一次鴉片戰爭勝利的產物，但它沒有像香港那樣變成了英國的殖民地。上海卻成了隸屬多國的條約口岸，有各國的租界，擁有各自的法律、條例、法庭和警察等。這種「治外法權」一直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大尷尬事，但對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說，上海卻代表了明日的中國。在這裡伊拉克的猶太人與白俄來往；英、美、法、德的商人爭相瓜分方興未艾的中國市場；天主教的神父與基督教的傳教士爲了拯救異教徒的靈魂而互相角力；來自各地的中國人擠在一起，生活在往往是難以言喻的貧窮處境中；世界其他地方無法容身和投機取巧的人，都能以上海爲家。一部一九三四年的上海旅遊指南解釋說：「上海並不代表中國。你可把它當作任何東西，但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國，雖然至少它

在人口方面幾乎全是中國的。」

上海對無數離鄉別井的外國人來說確是個好地方，他們可以在法租界大吃奶油蛋糕和蛋白杏仁甜餅，在國泰飯店（即今天的和平飯店）欣賞爵士樂，在新新百貨商場隨意購物，與福州路的歌妓一起尋歡，假若狂歡過後要做點補贍，明天還可以到徐匯主教座堂參與彌撒。但在這個外國人社區的背後住著極大多數的中國人，他們都是爲了碰碰運氣而來。他們有些是富有的買辦和大商行的中間人。但更常見的是一班可憐的窮苦力，天天盼望自己能僥倖地得以果腹，他們在橫街窄巷裡生活和工作，受著淤塞在溝渠裡的人類排泄物所薰臭，有時這些臭氣竟來自一些骨瘦如柴的中國人屍體，他們有的死於飢餓，有的死於工作過勞甚或被謀殺。舉個例說，單在一九三八年裡，市政廳貨車清晨從街上移走的屍體就有十萬一千零四十七具。雖然公園從未眞有過「華人與狗不准進入」的告示出現，但一直有人討論著一系列的規例，其中一條確是禁止狗隻，

而另一條則是禁止無外國人陪同的中國人內進。一旦人民解放軍開進了上海，那兒的好傢伙們便卸下羅衣改穿毛服，整個上海市就如全國各地一樣披上了一副共產黨式的正經模樣來。

昔日繁華的上海已在今天挾雷霆萬鈞之勢捲土重來。豪華飯店如雨後春筍；國泰飯店（今稱和平飯店）的爵士樂隊把樂器拂拭一新，並且夜夜笙歌；昔日的舞廳已被的士高取代，衣著暴露的女士在五彩繽紛的舞池中跟著最新的搖滾樂旋轉起舞。辦公室的租金往往比香港的還要高，市長還聲言要取代香港作爲亞太區的首要金融中心。對雜誌來說，上海的轉變大有可利用之處，可讓它們大做文章報道它陰暗生活刺激性的細節，包括淫業的復甦，而取締淫業本是昔日共黨革命所引以自豪之處。這一切都反映著明日的中國，在這國家裡人人爲著今天而生活，這裡的伴唱歌廳和按摩院滿街滿巷，入口處都放了迪米路的維納斯女神像。

在這裡享受繁榮的人顯然並非一群如瑞士公民

般奉公守法、不爲所動的人，因此一旦政府失去了操控和社會規律鬆懈起來，就足以使人憂慮到這突然而來的繁榮對將來會有甚麼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中國人心目中並不如海外人士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陰暗面懷有反感。造成今日的轉變正是中國人民。當我們從外界觀看這些轉變——那吵鬧、粗鄙和不受約束的增勢——便會突然感到簡樸是多麼難能可貴，即使是那種專制毛澤東主義式的簡樸。但對一班飽受文化大革命摧殘和在共產主義中長大的人來說，這種節制無度本身只是一種反作用，以補償他們多年來不得一嚐的東西：機會。

確認這點是極其重要的。文化大革命誠是我們所知的中國有史以來最惡劣的時代，但主流文學顯然沒有對這個時期作出應有的批判。相反地，好一班「中國之友」卻在他們寫的旅遊書和評論上，大捧特捧那在毛澤東主義下的大陸被塑造出來的新人類，他們看似從未受到原罪的壞影響，而且不受一般自然及經濟律的規範。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在一九七二年寫道：「美國人可從今日中國的集體生活中，學習到每人對近人的道義關懷的要素，這是各人應該學習的。」甚至連教宗保祿六世也稱毛澤東主義是個「在思想和行爲上合符道德的社會主義」，而他說這話時許多天主教神父和主教正爲了忠於羅馬而身陷囹圄。

這點也改變了，雖然我還不知其所以然。直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鄧小平一直廣被喻爲「務實主義者」，突然之間竟變成了一個鎮壓民運的主子，這種變化只是改變了我們對他的想法，但爲他本人來說卻沒有甚麼大不了。一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保持著緘默或爲它最壞的暴行作過辯護的人權組織，如今卻把中國當作一個國際賤民看待。無可否認，中國之內尚有許多值得我們關注和譴責的地方，（如果可能）中國還要數十年才可達到台灣或香港的水準。但如果我們要判斷中國的進步，就必須要問兩個關鍵問題。首先，在我們譴責中國的作爲前要問：我們拿它與誰比較？它較從前更好還是更壞；

較在它前已走過這路的國家更好還是更壞，例如南韓和台灣？其次，雖然我們並不否認任何弊端的存在，畢竟，我們需要把注意力更集中在「如何」上。

換言之，我們要問：革除弊端的最好方法是甚麼。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解答，而且不同的人對中國進步的程度有不同的見解。但今天任何對中國的公道評價，不論它今日的情況有多差，也必須結論說，這國家總比一九四九年以來任何一段時間內更自由。

誠然，這些問題的提出已是相當進步的標記，這進步並非來自執政者內心的轉變，而是因為真有需要去革除那些在機會增加後而引起的社會弊端。本身來自共產社會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很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並把它們歸因於缺乏「私人創業的權利」。似乎更重要的是，教宗不贊成信友把弊端歸咎於共

產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他寫道：「很久以來，那些最基本的關係受到了歪曲，經濟生活上的基本美德，如誠實、可靠和勤勞等，都受到貶低。」一位經濟學家會這樣說：競爭的相反並不是合作，而是串謀

勾結。教宗卻會用更人性化的措辭說，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於它裝出了一副善良的姿態。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特徵基本上與民主制度的相同，它不是靠聖人的教化來推動的，而是藉著締造一種社會風氣，使創業成就建基於協約而非制約之上。資本主義吸引參與者彼此自由結社以達致共同目標，這或許就是聖多瑪斯所說的習善而成的美德吧！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在面對市場的美德時，只會勉為其難承認它在改善物質生活上有技術性的優勢，即使那些認為中國的開放政策走得太遠的人，也會同意中國最低限度能做到使人民得到溫飽，並且相對地也很滿足。但當我們讀到《百年通諭》中以下這段話時，不免會想到教宗比他們已更進了一步：

當人出產貨品，如非供自己所用，則必以自由議價所得的公道價錢供他人購去使用。這種預見他人所需再好好配合各種生產因素去滿足需求的能力，正好為現代社會帶來另一種財富之

源。此外，不少財富均非個別人士所能獨力完成的；大家需要通力合作才足以達成共同的目標。組織起這種生產力量、計劃所需的生產時間、積極配合要滿足的需求、冒應有的風險等等，亦為今日社會中的財富來源。

在今日的中國裡，這並不關乎理論，而是實踐的問題，至於其效益（不單是那明顯的物質效益）則應放在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大開門戶前的社會背景下來評斷。市場的發展逐步迫使會控制一切的制度讓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單位」制度的瓦解。單位制度在中國共產政權中的作用，與作為社會基礎單元的美國家庭制度相仿。但是，在中國每人都被指定屬於一個單位，決定他在何處生活、在何處及如何工作、何時可以結婚等等。戶籍簿上沒有蓋上單位的印，人們就無法為自己的家庭分配得居所、為兒女登記入學或獲得醫療服務。

沒有甚麼比得上中國推行人所共知的一孩政策，更能顯著地反映出單位制度的力量。毛思迪（

Stephen Mosher）在其所著的《劫——一個中國婦女的自白》一書裡，從一個單位女護士的觀點，生動地描寫出政府如何執行其強迫絕育和墮胎的政策。故事的女主角以負責單位的護士身份，記錄廠內各女工的經期，以便知道誰懷孕與否。今日的中國雖仍致力推行一孩政策，但幹部們就較從前更難於執行了。單位的瓦解使政府難於密切監視那些企圖迴避這政策的人，再加上大概一億的流動勞動人口，這政策根本就無法執行。香港的書刊就充滿了這新一類「黑市嬰兒」的故事：即未獲批准而誕下的第二或第三個孩子。許多人就是靠繳付罰款來迴避法律，因為他們現在能負擔得來。

最先實行經濟改革的廣州市和深圳經濟特區，社會陰暗事例很多。去年發生了幾宗工廠下場壓死被困工人的意外後，那些要賺快錢的香港和台灣商人，都弄到聲名狼藉。更有一次，一個棉花廠廠主派工人回到烈焰沖天的廠房搶救棉桶，因而導致工人被火燒死。雖然如此，不管工作和居住的環境如何

惡劣，廣州車站每天仍有數以百計的外省勞工湧至。這又為甚麼呢？

其中一個理由是，這兒比他們原來的地方好。廣東省約有整個越南或菲律賓那麼大，而這兩個國家一向被視為「人口過盛」，但廣東省卻約有六千六百萬人。中國推行改革十五年以來，廣東省不但使本身的居民有工可做，還從省外引入了一千多萬工人，而且還有數千萬人會到來。這批工人並不如我們在外面所想像的那麼無知，他們所取得的知識——有關薪酬、技能、工作環境、其他選擇等——正是中國獲得富強的寶貴因素。在我所參觀過的「耐克」鞋廠裡，存在著明顯的等級制度。大致上，本地的廣東人處於中間階層，他們多是技術工人或初級管理人員，他們所得的薪金是處於低下階層的外省勞工薪金的兩倍。當然在這個尖塔制度頂的就是台、港同胞了。這一切並非巧合，在全省的工廠中都有這個現象。廣東人經過十五年的奮鬥，終於達到了這個地步，不再需要忍受血汗工場的待遇。

千萬不要誤會，這些爬上來的人並不是坐享某人的慷慨。不過，他們所得的選擇，是直接繫於投資的程度的，任何限制這投資的措施都會限制了他們的選擇。我們還要切記，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說過，我們之所以每日能有麵包吃，並不是因了麵包師傅的慷慨。同樣，認為到中國經商的人有心謀求利潤以外的事，根本完全不切實際。值得我們關注的倒是他們的實際影響。中國人喜歡在外資公司多於在本地公司工作，而且在外資公司中又特別喜歡美資公司，這點顯然並不是巧合的事。這對美資公司來說也是一個很健康的激勵，使它們在一個立場越來越堅定的中國裡，要質疑到它們在實踐上的問題，並迫使它們要自律，即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著想。假若去年工廠下場意外的東主都是美資機構的話，它們很少能抵受得住因此而來的壞宣傳。這種顧慮遠比單靠規例來得更有效。

這一切對將來有何意義？很明顯的，中國堅決要繼續發展，雖然它已經走了很遠，繼續而來的每

一步卻越來越難走。如果台灣和南韓的經驗可以作借鏡的話，那麼隨著市場力量的發展，最終就會出現一班受過更佳教育、更富強和更有信心的中國中產階級，他們會提出一些與市場發展平行的政治要求，而他們的要求與政府順應他們的決心之間的互相作用，會斷斷續續的導致多次回復舊狀的情況。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一個由專制國家轉變成自由國家的經驗，至少不是一個像中國那麼大的國家。我們只需由前蘇聯不甚如意的發展就可以知道，自由是要遇到不少挑戰的。

可幸的是市場本身會營造更多的需求和引起期望；看來蔣介石和朴正熙也從未想過會帶領他們各自的國家邁向民主的，更不必說他們會有這樣的意圖了。畢竟他們卻這樣做到了，非因他們有意削弱自己的權力，而是因為他們若要繁榮的話，就需要放棄越來越多的控制。似乎我們目前在中國見到的也是同樣的情況，不同的只是規模更大，並且因了中國的共產主義而使事情變得更為複雜而已。今日，

明顯地中央政府已不能再控制日常生活的所有關鍵層面，而且越來越多的決定，至少是那些影響他們日常生計的決定，已落在中國人民的手中。

有趣的是，在沉鬱的中南海大堂裡，中國的元老在原則上仍不得講論他們正奉行中的資本主義（官方的名稱是「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他們以為終可找到一個辦法讓他們兼有發展和控制。短期而言，他們當然是對的，即使僅因爲那些還清楚記得短缺和匱乏的人，直至看見事情不斷有好轉，即使過程較為緩慢，他們仍會暫且盡量容忍政府的不公義和低效率。但長遠來說，前景就不太明朗了，如果我是個飽讀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領導人，我必定不會太有信心。

□